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2.5

社会学作为志业

Zygmunt Bauman

认识Izabela Barlinska

芝麻街

Tamara Kay

Rio+20

Herbert Docena

- > 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 > 乌克兰的女性主义
- > 日益危险的拉丁美洲
- > 哥伦比亚的黑人中产阶级
- > 俄罗斯社会学的真实情况
- > 擗节时代的英国社会学
- > 横滨世界大会
- > 意大利的大学拍卖中
- > ISA和联合国：犯罪和法律
- > 移民的死亡陷阱
- > ISA的eSymposium征求编辑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卷 / 第五期 / 2012.8

GDN



> 主编的话

社会学作为一种志业

Max Weber在1917年和1919年跟Munich的学生演讲“政治作为志业”和“学术作为志业”。他将毕生的政治学术经验浓缩为两篇演讲，阐述了志业的社会学概念，不过却没有讨论社会学如何作为志业。全球对话承袭了Weber的理念，将讨论此一主题。

这期我们以Zygmunt Bauman的文章开场。他并不赞同Weber笔下学术与政治的二分。对Bauman来说，学术因为管理的缘故和政治走的太近，而政治似乎又和权力脱了钩。社会学必须超越学术和政治的分野，进一步和公众建立起双向的对话。

这样的对话正是波兰社会学家Izabela Barlinska所说的波兰公民社会和团结工联当年的行动主义。Tamara Kay对于芝麻街在全球各地的政治文化实践也是另外一个很好例子。Koichi Hasegawa则促使日本社会学去公共性的讨论核灾之后的种种议题。而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就不断在促使女性弱势和边缘话议题的公共讨论，而Tamara Martsenyuk便是描绘了乌克兰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Herbert Docena则分析了联合国永续发展会议(Rio+20)中科学和政治的相遇。科学家尽可能保持中立以好取得利基，而这却也正是Bauman所反对的。

这个年代—Bauman笔下所谓的液态现代性的年代—特别需要对话。我们收录的文章就是这样的努力，包括了拉丁美洲的不安全感(Kessler)，非裔哥伦比亚人的种族主义后果(Vigoya)，联合国处理针对移民的暴力(Barbaret)，以及美国如何制造暴力(Elcioglu)。Romanovsky和Toshchenko讨论的新的俄罗斯社会。最后，如同Corradi所描述的意大利个案，危机让大学的师生走入绝境。社会学长期以来就是在描绘这种不安全感，然后这种不安全也带来了社运，也带来了一丝希望。

未来就像是“寒冷无垠的黑夜”，总是让人悲观。Weber在德国一次大战战败之后，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仍然怀抱着希望，期待将不可能转化成可能。社会学最崇高的一项使命就为了乐观地努力达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讽刺的是，不可避免地政治还进入学术，并将学术带入政治。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Weber和Bauman加入了这个对话。

全球对话一年发行5期，以13种语言刊出。请到[ISA网站](http://isa-berkeley.org)上可阅读全文。投稿请寄给：burawoy@berkeley.edu



论社会学作为志业：这期我们将开始连载一个新专栏。Zygmunt Bauman将在液态现代性的脉络下讨论社会学如何作为志业。



认识Izabela Barlinska：Barlinska的访谈中会有她关于她身世的故事，如何离开波兰远走他乡，如何和团结工联结识，如何加入ISA。



全球芝麻街的在地儿童教育：Tamara Kay分析芝麻街—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如何在各个国家受到欢迎。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Fabio Silva Tsunoda,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s Shahvand, Fatemeh Moghaddasi, Saghar Bozorgi, Nastaran Mahmoudzadeh, Najmeh Taheri, Tara Asgari Laleh, Milad Rostami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姬野宏輔, 高見具広, 岩館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資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l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c,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俄国: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Mustafa Aykut Attar.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社会学作为志业	2
液态现代性下的社会学志业 by Zygmunt Bauman, 英国	4
认识Izabela Barlinska 访问ISA执行秘书, 西班牙	6
> 协商未来	
全球芝麻街的在地教育 by Tamara Kay,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	10
科学的立场: 联合国Rio+20会议 by Herbert Docena, 菲律宾	12
>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by Sylvia Walby, 英国	15
乌克兰的女性主义 by Tamara Martsenyuk, 乌克兰	17
> 拉丁美洲的阶层化	
日益危险的拉丁美洲 by Gabriel Kessler, 阿根廷	19
哥伦比亚的黑人中产阶级 by Mara Viveros Vigoya, 哥伦比亚	21
> 国家	
俄罗斯社会学的真实情况 by N.V. Romanovsky and Zh.T. Toshchenko, 俄罗斯	23
搏节时代的英国社会学 by John D. Brewer, 英国	25
横滨世界大会: 连结更平等的世界 by 長谷川公一, 日本	26
意大利的大学, 拍卖中 by Laura Corradi, 意大利	28
> 特集	
ISA和联合国: 犯罪和法律 by Rosemary Barberet, 美国	30
移民的死亡陷阱 by Emine Fidan Elcioglu, 美国	31
对ISA的eSymposium感兴趣吗? by Jennifer Platt, 英国	32



> 论液态现代下社会学 如何作为一种志业

by Zygmunt Bauman, Leeds University, 英国



英国社会学会会长John Brewe介绍Zygmunt Bauman。Leeds, 2012年4月。

固态现代性的颠峰时期诞生于一百年前的西方世界，全心致力于摆脱旧时代的不确定与没落，疯狂地追求现代化。此时，社会学成为了大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大家从管理的角度都期待他可以为社会带来新的秩序。百年后的今日，社会学成为了显学，半推半就地让自己更有用、更有立足点，好符合当今掌权者的管理需求。社会学的术语或论证或许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教学与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却没什么差别。如此一来，社会学越来越不用背

Zygmunt Bauman毫无疑问的是当代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Bauman于1925年在波兰的Poznań出生，然后接下来有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位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成为Warsaw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到了1968年因为反犹太主义的焰气高涨，他被迫离开家乡波兰。1971年时Bauman成为了Leeds University的终身社会学教授。在80年代和90年代，Bauman出版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现代理性、斯大林的屠杀、以及理性主义面对外来者的无能为力，也因此博得声誉。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一书中处理了知识分子如何受困于理性泥沼以及如何从中逃离的议题。他早期的作品着重在批判高度现代性——一种现在他将之称为阶层和管制的固态现代性；晚期则把重点放在液态现代性上。液态现代性，顾名思义，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与不安全。Bauman著述丰富，眼光独具，影响力深远，所以担纲我们“社会学作为一种志业”新专栏的第一位作者，他是不二人选。

负改变社会的责任。这，是社会学失败所在。正如同像是Michael Burawoy等慧眼独具的社会学家曾经警告过我们一样：这样的失败让社会学脱离了现实的社会。。

社会学在学术象牙塔中被保护得很好，对于外界要求其挺身而出、扮演紧急重要角色这样的诉求，社会学总是可以置身事外。由于体制中的制式程序，像是毕业、升迁、人员轮替、招募新人、再生产等，社会学可以一直依附着这样的制度形式。而当今的世界变迁迅速，

>>

公众对于这种制度的要求越来越少时，上述的情况更加明显。而这也意味着：当大众对于改变旧制度的要求日益增加、旧有管理与科技的制度逐渐成为历史时，因为社会学实际上有能力提供一种新制度的想象，所以这和社会学仍然依附于旧制度的情况，有着很显著的落差。今日的世界越来越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个人化，所以对于新制度的要求可说是非常迫切，但是却也相当匮乏。新制度的该被应用到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生活政治”之中，让人们可以找到如Ulrich Beck所言的“社会问题的个人式解决办法”。这也是液态现代中人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學因為要回應某種管理的需求，總是试图想成為一種“研究不自由的科學/科技”：理論上來說是在研究社會，但實際上來說是在解決Talcott Parsons所提出的霍布斯問題，亦即，怎麼在一種模糊自由意志的祝福/詛咒之下，引導/強迫/引誘/教育人類去服從社會秩序、聽命於管理和監控階層的命令呢？或是，如何去調節自由意志和服從權威，以致於傾向成為La Boétie所說的志願奴役？簡單說，就是如何讓人們甘願服從？

在当代，由于管理革命(包括管理者将他们的管理工作附属于那些被管理者)，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因此，此刻的社会学有了绝佳的机会去进行转型：转形成为“研究自由的科学/科技”：去探讨在理论上受到命运操控的个体如何成为在实际意义上自主的个体；或是借用Jefferey Alexander的话来说：社会学的未来(至少是不久的将来)取决是否可以转型为致力于人类自由的文化政治。

如何达成此一目标？策略为何？我想，方法在于要持续不断地跟社会行动者的知识进行对话(这对于旧时管理思维的社会学来说，这种知识是不具认知上的意义，且要被揭露、铲除、矫正的)。而这点也在Richard Sennett最近谈论到人本主义的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非形式化，开放，合作。非形式化(informality)是指对话的规则并不是事先订定的，而是在对话过程中浮现。开放(openness)指的是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宣称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而企图去说服其他人(那些见解错误的人)。合作(cooperation)意味着对话的所有参与着同时是老师也是学生，没有谁是赢家或输家。总之，忽略这些原则的代价，就是社会学将变得无关痛痒。

社会学过去宣称要去掀开社会的神秘面纱并且掌握社会运作的肌理，而今，社会学正处在一个如Hull University的Keith Tester所说的过渡时期：旧思维慢慢地被认为不再适合，可是新思维却又还不到取代前者的地步。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成功机率都很小的时代。我认为，这个前提之下，任何提出预测人类命运的方案都是不负责任的和有问题的，因为想要碰触到液态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基本上是缘木求鱼，而且我们解决或检视问题能力的缺乏，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的前提。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得因此放弃尝试，而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尝试都视为只是暂时的：在宣称我们找到最终解答之前，或是宣称这个志业已经被彻底实践之前，我们永远都需要更多的尝试。



> 认识 Izabela Barlinska

相信大家对Izabela Barlinska都不陌生，而她也认识ISA里的每一个人！Izabela是一位有条不紊却又不失创意的人，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但语气却非常坚定。她的人生有35年的岁月都奉献给了ISA了！此外，Izabela还精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与、俄语、波兰语。她，就是我们ISA在Madrid总部的秘书，总管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她有另外两名助理Nacho和Juan。从帐务、会员、协调建议各个委员会、各种会议等等，这些都是Izabela的业务。每一位副会长和会长都要跟她请教，借重她的知识、智能、与经验。

Izabela从1987起担任ISA的执行秘书。在她任内，ISA可谓蒸蒸日上，会员人数从1200人增加为现在的5000人，并有55个国家会员和55个研究委员会。她初次与ISA结缘的时候还是个在Warsaw的学生，然后随着ISA从加拿大到荷兰，辗转再到西班牙。这段期间她不但完成了博士论文，还以西班牙文出版成册，叫做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Solidarity。她在波兰反对运动的经验中学到了如何在各种棘手的情况中保持冷静与缄默，使得她能胜任这份在ISA的职务。Michael Burawoy在2011年9月27日于Madrid访问Izabela。访谈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她离开波兰并接触到ISA的心路历程，刊登在本



Izabela Barlinska，旁边的是Juan Lejarraaga。摄于ISA秘书处，Madrid的Complutense University

期。第二部分是关于他在当了ISA执行秘书之后，与ISA从扩张到稳定的种种经验，这部份将在下期刊出。

布：Izabela，妳当初是怎么接触到ISA，并担任这份有趣却责任重大的工作的？

伊：嗯，我想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意外插曲。我的阿姨Magdalena Sokolowska应该是个关键的人，因为她在1977年时是ISA执委。还记得那时候正值春天，我正在Warsaw大学忙着准备我考试。有天，我阿姨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可以帮她一个忙，就是跟着她两三天，去办一场国际研讨会。你知道的，通常这时候总是需要一位“小女孩”帮忙处理接机、接送、行李遗失等等这种事情，所以那就是我了。

布：为什么她特别找妳帮忙呢？

伊：我想是因为我会说俄语和英语，而且我又正好找得到。不过时我正在准备考试，所以有点左右为难。不过我爸跟我说我一定要去，没有理由拒绝。我想即使一个人到了20岁了还是得听父母的吧！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就是都待在机场里面。我想说的是，那可是波兰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当时情势很艰难，也没有人会讲外语。所以我就是整天坐在机场，然后边看书准备考试。不过当时的执行秘书Kurt Jonassohn和Céline Saint-Pierre似乎注意到了我，就说他们将在明年的夏天，在瑞典的Uppsala举办ISA的世界大会，他们希望邀请很多东欧的学者参加。因为我会俄语，所以他们觉得我应该会有兴趣参与这份工作。

布：那真的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邀请哪！

伊：没错！想想看，可以到瑞典工作一个月，这多赞啊！我想都没想的就点头答应了。我当然想去！后来我去了，是当时的会长Ulf Himmelstrand (1978)去码头接我的。我用最便宜的方式到瑞典，这个方法就是搭船走波罗的海。后来我就在瑞典做大会的准备工作，之后我被正式安排到大会中的一个职务，并分配到一张桌子，那桌子叫做总咨询处。

我想没有任何的事情的起头会比这个还要更棒的了！其实那时候我对ISA并不熟悉，

而在做的事情也只是像是帮一位老奶奶找她的孙女，而这个孙女可能跑去Stockholm玩了的之类的。总之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总咨询处要处里的任何杂事就对了。不过显然我表现得应该不错，因为后来Kurt Jonassohn和Céline Saint-Pierre又希望我可以去帮忙1982年在墨西哥的大会，并先在1981年底到Montreal。没错，我又再一次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工作邀约！半年的时间在Montreal，并且有奖学金，这多么吸引人啊！所以我后来就开始申请护照。你晓得的，在共产国家要申请到护照并不容易，不过最终我还是拿到了。

布：那时是团结工联的时代，波兰正处于动荡之中，对吗？

伊：对，而且团结工联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我之所以会接触到政治反对运动是因为我的一位历史老师，她教波兰和东欧史，和官方的历史很不一样，让我很感兴趣。我们学生常被邀去她家作客，也结识了一些异议分子和反对人士。所以一踏进这个圈子，就会陷入了。

所以在1980年大罢工开始时，我的角色是跟来波兰的外国记者联络。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戒严，然后我就有麻烦了。警察开始到我家搜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跟外国电视和记者有很密切接触的缘故。所以我12月的加拿大之行只好先搁着了。不过，一段时间过后，波兰政府好像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有点操弄政治的感觉。总之在那之后波兰边界又开始开放了。

在戒严时期所有人都要缴出护照。在1982年3月，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护照在那，要不要拿回去。我有了加拿大的签证，万事具备了，但我不想走。我和反对圈子的人谈了很久，他们都说我一定得去，因为到了国外，我可以发挥的影响力比留在波兰还大。我最终是走了，不过并没有多开心，因为我在波兰出生长大，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我到了加拿大之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要申请政治庇护，可是，那其实是最不想做的事情。我搭飞机来、有护照、人也到了，就是这样，没别的。于是我就开始在ISA秘书处工作。我得说，那里的人真的很好、很友善。后来我和Jacques Dofny与Alain Touraine成为好朋友。Touraine后来是副会长。不过其实我在

>>

团结工联的时候就认识Touraine了。

布：在你去加拿大之前，Ulf Himmelstrand到波兰访问，而你与ISA还有短暂的接触过？

伊：他代表ISA去波兰考察情势。那时是1982年的冬天，Warsaw街上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坦克，军队控制了整个波兰。我和Ulf在机场碰面，然后在街上看看，和许多社会学家碰面。我那时候觉得Ulf的报告太政治正确了，政府看了会很高兴的那种。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必须要很谨慎小心写这份报告，不能泄漏信息来源，要保护那些波兰社会学家。

布：那个时候的ISA执委是怎么处理冷战议题的？

伊：那时候都很小心不要得罪任何一方。他们都知道执委一定要有苏联的人，不然就会有麻烦。所以那时候的执委选举充满了浓浓的政治考虑。

布：所以后来你去了Montreal去准备1982年的世界大会，然后就从此加入ISA了？

伊：是的。在墨西哥，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被选为会长，然后秘书处决定迁往Amsterdam。所以我就去了，跟着一位新的执行秘书同时也是社会学家的Felix Geyer工作。在那边总共待了4年，而那4年也是由大学所资助的，我们在Amsterdam大学有一间办公室。

布：那时你关注的是除了ISA的其他事情吗？

伊：嗯，我要适应新环境，而且我的确开始和波兰的反对运动人士见面，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到了Amsterdam就更容易。然后我开始写这些事情。这些经验并不容易，但是都很有趣，是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的革命。我很幸运可以亲身经历这场历史事件，见证了一个国家经过了30年之后终于转形成为一个自由国家。

布：对，团结工联是一切结束的开始。你没有寻求政治庇护，为什么呢？

伊：我没有寻求政治庇护的原因是我怕我的家人遭受牵连。不过我也很试着去想怎么才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波兰所不为之的真实面貌。我想要很坚定我的反抗意志，我所做所说的都是对的，不过那时共产政府还未彻底瓦解。总之很显然的那个政府是不太对劲的一件事。不过我算是生活还算体面的人，来自中产家庭，父母都有工作，收入也不错。我发现到我其实算是出身好的小孩。教育和知识那时候在波兰是很崇高的东西，我们虽然都困在里面，不过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事实，也很热切的去学课本以外的东西。正如我之前说的，我很幸运遇到一位老师，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必须熬夜把一本书看完，因为隔天就要把书再给别人了。以上种种都是很常见的波兰经验。

布：这些比较像是你解释给人们、让他们了解波兰的故事。那我很好奇你本身怎么看待团结工联呢？

伊：我觉得很兴奋！但后来变得有些批判。不过总之那是个停不下来的力量。在戒严之后，工联就转入地下运作。那是个非常特别的年代，你会看到在街上人们排队领牛奶，大家为了生存而集结，为了争取些什么，为了改变情况等等。那时有一种特殊的团结感驱使着我们行动。

布：没错！还有教会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伊：教会就像个保护伞，保护着反对运动。特别是当有些父母被抓走时，他们的小孩需要有人照顾。那时候商店关门，车子停驶，所有的事物都停摆了，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

布：你将这些议题写进了你的论文，后来并以西班牙文出版了一本书，叫做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Solidarity，对吗？

伊：是，我的博论的确是写波兰的公民社会和团结工联。当然我不是在讲我的生命经验。而我也不是把工联当作是社会运动，因为这已经很多人写了。我把他们视为是一种生命的再组织，以及人们的常生活等。我写了一章关于反对运动的分析，

>>

然后写关于人们怎么组织日常生活，像是以物易物等等的。我在University Complutense (Madrid)的指导教师Victor Pérez-Díaz建议我把反对者的生命史写进去，这样一来好让那些非波兰的读者可以更进入脉络。

布：在共党统治下的波兰反对党是什么样子的呢？

伊：反对运动都不批判共产主义，他们想要改善政体、改善系统，希望共产主义更人性一点。

布：那是在1950，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团结工联代表的是同样的事情吗？

伊：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如果我们看团结工联的诉求会发现在最一开始时他们还包括了自由贸易联盟，但最政治的部分就仅止于此了。其他都是像要怎么让共产主义个适合人，工作环境更好等等的，没有人质疑那个共党体制，要求的都是怎么让生活变好。

布：你到Madrid之前，1982-86年时你在Amsterdam，那时你是许多异议分子的联络人，帮他们保管地下书籍，并且从你这边得到更新的信息？

伊：对，我家永远有多余的一张床给房客留宿用。我家人和反对份子也都有联络，然后他们来这里都会在我这边住。这也是我会认识Ryszard Kapuściński的原因。

布：你有和著名的Ryszard Kapuściński碰过面？他一定是个很传奇的人物吧？他写过

关于伊朗、依索比亚、苏联的书都很棒！

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很好玩。他到Amsterdam去推销他的一本书，他也帮我从我家人那里带来了一些东西，主要是禁书。我当时住在荷兰典型的阁楼里，很狭小也很多楼梯，结果他就扛了那些东西，一阶一阶地爬了上来。当他一到的时候，就说：“不行了，我得躺下。”因为他有背痛的毛病，他扛了那些书让他背更痛。所以这个有名的作家就这样躺在我住处的地板上5个小时，动弹不得。所以也这样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布：所以他除了跑国外的新闻以外从未离开波兰，？

伊：对，他一直都在波兰。总之我们谈了很久，我对人生充满了困惑，然后他告诉我：“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98%的人都很快乐，因为他们很安静，生活无忧无虑。但有另外2%的人像你一样，会问很多问题。”接下来他听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那2%的人有义务一直继续问问题。”

(待续)

> 儿童教育： 芝麻街全球化 与在地化的辩证

Tamara Kay,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

南非小朋友正在跟Kami玩。Kami是一个毛茸茸的5岁HIV阳性的小女生。

©2007 SesameWorkshop。Ryan Hefferman摄影。在这可以看到各个国家芝麻街影片：<http://www.sesameworkshop.org/>



在印度城市里的贫民窟中，小孩们围在一台老旧的推车上，看着DVD的电视节目，里面的角色正在用Hindi唱“ma”这个声音。在坦尚尼亚，一群小朋友正在收听如何挂蚊帐防制疟疾

。在南非，有10分之1的小孩其父母因HIV/AIDS而死亡，而电视节目告诉他们如何将这种疾病去污名化，如何面对失去与死亡。以上这些场景，有两个地方是相同的：这些孩童在上学之后其实是属于程度比

较不好的一群，而现在他们正在利用芝麻街节目来减少他们的不利处境。

芝麻街的普及和成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化的绝佳例证。这里展现了两个彼此交织缠绕的谜题：美国的文化产品

>>

如何透过跨国组织传播出去？这样的产品如何在地方上获得正当性，并广为被接受？

The educational nonprofit Sesame Workshop (SW, 前身为The 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的案例可以解答上述的问题，因为SW在世界各地成功地开创了接受度高、共同合作的芝麻街节目，教育学龄前儿童。此外，SW也和不论是政府、公民组织、NGO等在地的组织合作，并以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目标为优先，处理从识字到健康等议题(包括坦尚尼亚的疟疾防制，南非的HIV/AIDS防制等)，还有社会平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南非、北爱尔兰等地的宗教和族群包容议题)，等等。这些计划以移动式的牙医诊所、模范学校、公共宣传、免费物品的分配(书、教育游戏、DVD、家长手册等)，强化地方家长的教育目标，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看到电视的地区的孩子。

访谈和民族志中我们发现在拉丁美洲，尽管有些内容或许会有争议(性别、种族等)，对于芝麻街节目的接受度相当高，很大的原因在于SW愿意和当地的合作伙伴讨论。SW是跨国组织中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在各地组织在地的团队。虽然还是有所限制，不过在地团队已经有很充裕的自由去制作节目。所以SW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以往总是不为人知的协商过程，而这个协商政治正式让文化整合得以可能的关键所在。

在科索沃，协商让SW重新去检视何谓核心价值：用字母系统去教育文盲。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对字母系统并无共识(无论拉丁或是斯拉夫语)。除了语言问题之外，他们也不愿让节目中出现两个不同族群的小孩在一起的画面，因为家长不会让他们的小孩收看这种节目。这种种限制原本差不多

要让合作计划夭折了，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想出了别具创意的解于办法：用“视觉字典”，就是让小朋友手上拿着物品，例如太阳眼镜，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说出那个物品。

文化接收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是很重要的。1994他们拒绝被并入以色列，并要求相互承认尊重。他们担忧芝麻街会危害他们国内新的但是脆弱的电视节目，而且和以色列与美国人合作肯定会遭受抨击。不过团队核心认为这是一个训练巴勒斯坦年轻人和建设基础建设的好时机，所以要求大量的资金要放在人员训练上面。总之，巴勒斯坦的文化接收取决于他们如何和美国去协商，去表达什么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共同产品内容的协商是很重要的，这样一来才得以满足SW在孟加拉国和南非的在地需求。孟加拉国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很犹豫要不要在节目中加入芝麻街的布偶，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有历史悠久的木偶戏传统。虽然SW没有要求他们使用布偶(如由Jim Henson Company所创造的木偶)，孟加拉国的团对最后决定设计自己的布偶(包括孟加拉国虎和狼)，以及在Sisimpur加入传统的孟加拉国木偶。SW和在地团队一起讨论出了一份计划，并得以整合在地文化，透过Ikri这个布偶，这个进入Ikri世界里面一孟加拉国传统木偶所居住的地方。南非则是在第二季的Takalani Sesame中加入处理HIV/AIDS议题的单元。尽管SW一开始有点迟疑，不过最后他们还是一起创造了一个HIV positive的角色：Kami。

证据显示SW的么行对于计划的结果有正面的影响。共同生产的成功与计划的普及让人啧啧称奇。在孟加拉国，使用Sisimpur的小孩被发现比其他不用的孩子们高出了67%的识字率。在埃及，收看Alam Simsim的四岁孩童的数学表现和五年级的学生一样。研究也

发现在地的高接受度也增加了SW的正当性与普及性。SW不仅研究共同产品的教育效果，也研究产品是否被认为是在地的(事实上正是)。在埃及，18个月内Alam Simsim的普及度就有98%，现在就跟美国生产的一样了。印度有5200间公办的托育中心将Galli Galli Sim Sim纳入其课程之中。Sesame Street或许是最受欢迎的儿童教育节目了。

有一个研究传散的理论指出了一个新的框架去理解那些限制和导致接收者反抗文化全球化的因素。这个理论也说明，若是一个文化产品可以成功地被世界各地所接受，那其实是有赖于跨国组织之间更平等的关系。虽然传播反映了西方价值、习惯、产品的霸权，在SW的案例中我们则看到了接收者的力量、影响、自主。在芝麻街上，我们的确看到了文化的协商是如何可能的。 ■

> 科学的立场： Rio+20永续发展 联合国会议

by Herbert Doc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1



2012年6月20日Rio+20会议中人民
高峰会游行的雕像之一。Herbert
Docena摄影。

联 国会议每年越办越大，吸引了许多政府官员、社运人士、企业经理、名人等争相参与。今年6月在Rio de Janeiro举办的联合国永续发展会议据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联合国会议，科学家可是挤破头的想参加。

大企业的总裁CEO是在高级酒店里面开会讨论生意，社运人士则是在公园里面召开人民高峰会；而科学家则和官方的会议同步，在Ip-anema附近的Catholic大学召开了“科学、科技、创新论坛”。不像其他企业或社运的会议，这场科学家的集会目的并不太明显。不过无论如何，这其实展现了科学在这次的环境危机中所采取的姿态与立场。

> 这是什么样的学术会议？

>>

虽然我们可以看见有各种尖端技术的报告，不过这可不是一般典型的学术会议。因为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来一一的讨论报告中的议题。多数的参与者是官方代表或是特定组织的人员，像是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或是伙伴组织如UNESCO，以及科学NGO，例如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我是本届代表)。还有其他零散的参与者来自各个科学的领域，或是营利企业，像是Dow Chemical的副总裁或是Blackberry的CEO。

若要说目标是去强化不同学科之间的连结，那么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与机会让参加成员去彼此交流。因为在5天的议程里面，观众要坐在台下一直听台上演讲，一场接着一场，7到8为讲着轮番上阵，一讲就是2个小时，Q&A的时间通常只有最后的15分钟而已。

不过还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有一位地理学家说他还好不是个环境经济学者，所以不用去想要很伟大地去测量生命的成本或是森林的价值。这样的宣称其实碰触到了社会科学内存在已久的争论，也表达出了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对立情结。另外一个例子是当一位工程师偶然间说到社会科学的角色就是去评估工程师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文化上的妥当性。这个说法也触及了长久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辩论。再者，讲者们其实都认为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是自然科学家，而社会科学家却都被晾在一旁，好像他们连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都无关紧要。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是所有自然界中物理和道德最为有力的集合体”，似乎才可以稍微掳获社会学以外学科的目

光。

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反映了学科之间世界观的差别，也提示了我们它们之间隐微的权力关系议题。这个议题可以透过深入的对话而进一步讨论，这次的跨学科会议就是很好的例证。

> 寻觅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

就像主办者所说的一样，这场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科学家化解歧见。的确，你会发现参与的听众多数不是科学家。

一周的会议下来，讲者的对象其实很明显的有2群人，而部分的人就在台下：政府与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企业人士。讲者大多都批评科学家和投资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就是后者对于前者并不感兴趣，也不怎么想要支持。所以演讲者都希望可以填补这个缝隙，建立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讲者也为了找来更多的资金赞助者、企业人士、决策者等一起去共同规划与生产，好帮助业界或实务界去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后者可以拿到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公民社会的其他部门”也在会议中被强调，不过非科学家的人中，没什么人有兴趣想听。科学家希望藉由提供政府和企业相关的知识，像是“GEC”(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等，让他们开始去想象未来。总之科学家现在努力的想要打造一个概念：“绿经济”。

可以确定的是会场内还是存在批评的声音。举例而言，ISSC的代表常挑战来自自然科学之科技官僚式的言论，并指出当今环境问题的历史与系统性成因。也有与会者认为要和社会运动更广泛

的结盟，例如和在厄瓜多要求“别挖石油”的社运团体。

然而多数时候会议所展现的不过是科学—政府—企业三方的对话，这是很传统的科技官僚的预设和管理学的想象，也就说：通常决策者不具有知识，需要科学家来提供，然后有了知识做为参考依据的决策就可以挂保证了。无知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解决的办法只在于由上而下的管理，而非由下而上的反抗。

其中的一个方案就是去体现上述这项预设。这个ICSU的“地球的未来”的计划相当有野心，规划了10年的研究，企图纳入上千名科学家去传播得以让地球永续发展的知识。而这项计划也已经得到了好几位有钱的研究赞助者的背书，是“史上最特别的伙伴关系”。Blackberry的CEO也很赞同这项计划，鼓励可行的研究方案，并且提醒在场的听众要避免“空想”的危险。

尽管有些批判的声音，不过场内呼吁政府与企业要与之并肩作战的诉求，让这个会议很难不和游说联想在一起。这场会议由科学家所规划，目的是要政府和企业多支持科学家的计划，去投入资源一起适应和管理我们目前面对的环境危机。

> 待解的问题

科学家试图找寻和企业与政府合作双赢的机会并不代表这些科学家就是见钱眼开的研究者。他们有可能真的是有意无意的和他们所设想的那些合作伙伴有着一样的看法。下列这些正是其中几个本来应该在会场中被提出讨论但是却有的问题：



人民峰会在Plaza Floriano的抗议游行。此处是Rio de Janeiro的downtown，距离主会议40公里。Herbert Docena摄影

· 我们是否应该将自然想象成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而我们又该将这些服务营利化吗？

在Rio的官方峰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许多社运人士甚至很反对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字眼，因为这个字被美国等其他已开发国家长期以来推动使用，最终的担忧是怕自然有一天被“金融化”。不过科学家还是一直在用这个词，用得很高兴。当被质疑时，其中一个地理学家(一位“地球的未来”计划的倡议者)这样回答：“去读一下上一期的“自然”期刊。基本上你的问题根本已经不成问题了，好吗？”

· 真有可能去调节开发和环境保护或永续发展吗？绿色经济真的可行？

在Rio的人民峰会中，无止尽的成长被认为和永续是毫不相容的。绿色经济责备嘲笑为是绿色资本主义，保存自然是以备将来真的需要大规模的结构变迁时可以有充足的资本。不过科学家在做的是去向政府或企业推销他们的经验，让不可能成为可

能。

· 究竟谁该为环境危机负起最大的责任？我们和这个该负起责任者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次许多的跨国大企业和有钱的政府一所谓的权力菁英一是大家的众矢之的。人民峰会中把他们称为罪犯和凶手。不过在科学家的眼里，他们确是合作伙伴、设计伙伴、制造伙伴。“我们不应该把权力菁英视为敌人”，一位人类学家这么说。“那样讲很没建设性，我不认为我们有改变政治的能耐，能做的唯有和政府结盟，别无他法。”

> 中立的权力

企业家持续地去寻找政府和企业的伙伴，推销一个最大的卖点，而且这个卖点是在Rio的所有人都没有的：他们的“中立性”，事不关己，兴趣缺缺。他们在提倡“科学和社会的新伙伴关系”时，总是下意识地炫耀这个中立性，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社会一样；或是当他们鼓励和决策

者或是股东有更紧密的关系时，总是表现出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作决策，或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一点也不重要。或是他们坚持任何科学研究成果都应该是政策导向而非政策诊断时，表现出好像他们坚持的绿色经济就不是在为政策提出诊断一样。

然而，尽管这些科学家总是宣称自己很中立，不过事实上他们早已选边站了。■

註1: Herbert Docena感謝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的獎學金支持他到聯合國參加Rio+20會議。

> 竞合： 女性主义和 新自由主义

by Sylvia Walby,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国, 前ISA经济与社会委员会(RC02)会长



家庭和小孩在Camden的RBS/Nat-West bank参加Uncut的“Big Society Bail-Ins”抗议活动，反对女性歧视。伦敦，2011年2月26日。

人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意义仍存在着歧见。2007到2012年所发生的这场风暴是个经济再结构化的契机，可是，是要向左走(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或是向右走(新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呢？本篇文章认为：性别是这个结构化过程的核心议题，因为所有新自由主意和政府的方案都是性别化的。

>新自由主义的源头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个全球化过程，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有所差别。因此我们想要检视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公民社会、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实体等因素会导致什么样不同的结果。

在欧洲，危机带来的是政府支出的削减。不同国家之间或有差别，但差别不大。政府赤字和债台高筑让人们觉得国家都快垮了。对此，我们目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第一，有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是导因于福利支出过

多。这种解释只针对财政赤字，将问题归因于税收短少、经济萧条、失业率攀升等表面病因。

第二，其他有论点指出因为欧元作为共同货币，使得个别的国家无法调节自己的货币政策。但是所有的解决方式都是货币贬值。这是在1930年代就被证明是很糟的对策了(敌视欧元的英国也采用了)。

第三，另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因为现在的资本积累已经穷途末路了。未

>>

来不是迈向野蛮的弱肉强食，就是蜕变为社会主义(Harvey)，再不然就是转形成另一个霸权(Arrighi)。可惜的是这种论点过于决定性，忽略了政治与社会的脉络。

第四，还有最后一种主张一同时也是这篇文章想要进一步阐述的一分析道：金融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而是一种牵扯金融资本与政治力量相互缠绕而成的计划。在此论点之下，论者辩论到底何谓这些力量的本质与影响。当执政者无能为力处理问题，旧的政党就竭尽所能地想出手解决。新的计划，包括了Occupy运动和Uncut等，是一股在国家之外发展起来的政治力量；新的政党和联盟则努力想夺回政权。而此外我们会看到这个主张的特点在于：这些势力和计划都是性别化的。

> 撙节是女性主义的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中，个无论是教育、健康、照顾、或是就业管制的领域，都存在着性别化的面向。这通常是由女性主义和劳工主义的社会与民主计划的结果。这些政府政策与社会实践也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性别和阶级逐渐分道扬镳，因为女性慢慢地在政治上取得影响力，但是工会力量却逐渐式微了。而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对于既有的社会民主

制度发动了性别化的攻击。

税务也是女性主义的议题。国家编列预算的过程也是性别化的，而且分配给女性相关领域的预算特别少。在英国，House of Commons Library的报告中指出在2010的年度预算中，个人增税的总额是£81亿英镑，其中58亿(72%)是属于女性的，只有22亿(28%)是男性。然而税收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男性税缴得少)，公共设施的支出则大幅降低(使用者几乎是女性)。在这种几乎是免税天堂和引进金融交易税的情形下，政策都是性别化的。

英国的另一个例子是国家预算的减少以提供地方的社会福利，像是收容所等，并且提供工人支持和建议，然后防制针对女性的暴力。真是一种性别化的社会民主政策，因为提供的是对女性受害者的保护，而非对罪犯的严惩。一个例子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NGO和工会一起耕耘信息自由的这块社运战场。国家预算少1%，对于地方来说却是少了31%去防制妇女暴力案件，因为这些相关政策往往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

> 分歧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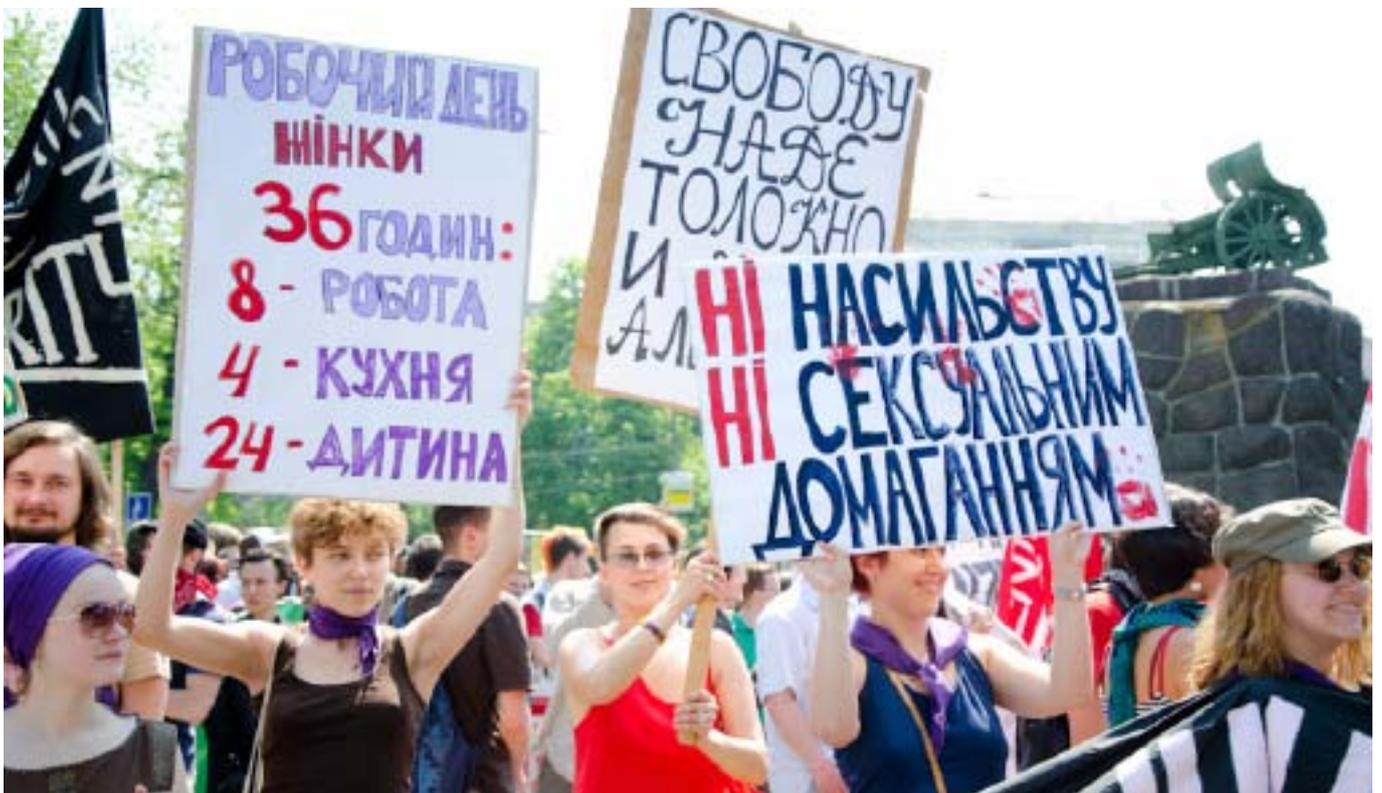
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与社会再结构化导致了許多重要但不同的后果。我们可以从对比公民社会的社运和挑战国家机器的社

运这个轴线来看待这个现象。公民社运，像是Occupy，在欧洲和北美可说是遍地烽火；不过还有其他是针对国家政策(税收)的运动存在，例如Uncut。新的政党势力在政府失灵的脉络下已经蔚为一股气候了，不论在法国(Left Party)、德国(Die Linke)、冰岛都是如此。这些左派政党带有着强韧的女性主义思想；这么一来，有些人想把左翼与女权运动分离、对立起来，这似乎不太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左派和女性主义的新结盟。例如在冰岛，社运就比较着重在民主化，而非经济危机的议题上面。

经济危机的警报还未解除。想改变结构的任何企图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运动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议题，也关乎性别。结果仍有待讨论！ ■

> 乌克兰的 女性主义运动

by Tamara Martsenyu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乌克兰



国际女权日(3月8日)让乌克兰女性不仅获得了许多鲜花的庆祝,也提醒了大家女性今日的权利可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争取才换来的结果。去年一位女权运动者提出了“Feminist Offensive”的构想,以新

的方式去庆祝女权日,包括女权工作坊、国际研讨会、以及女权大游行。

“Feminist Offensive” (<http://ofenzyva.wordpress.com>)是一个公共性的倡议运动,旨在与各种形式的父权对抗(性别歧视,恐同、恐跨

Ofenzyva (“Feminist Offensive”)的运动者在2012/5/1时于Kyiv抗议,标语是“Working day of woman: 36 hours: 8 - wage labor, 4 - kitchen, 24 - childcare”; “No to violence, no to sexual harassment”、“Free Nadya Tolokno” (一位和俄罗斯人Pussy Riot一起被逮捕的社运人士。Ofenzyva 摄影。

性别、年龄歧视、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并捍卫女性的经济和生育权利。此外也试图去改变社会和法律上的性别歧视，并开创更多的性别批判研究、独立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的解放知识，以及性别平等的语言。

为期3天的“女性主义：集体观点”国际研讨会(3月5-7日, 2012)，象征着女人的集体认同。由Feminist Offensive所举办，学者和社运人士齐聚一堂。与会者来自各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塞尔维亚、芬兰、法国、美国。在“女性主义政治参与”场次中，参与者与大家分享草根如何对抗女权被侵害的运动经验。女权团体“La Barbe”(英文的beard, 山羊须)借着戴上山羊须，进入会议场地干扰，去强调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长期缺席。“ACT Women”(塞尔维亚)则在街上以行动表演表达他们对于性别歧视暴力的批判(国家暴力、屠杀女性、强暴等)。俄罗斯摇滚团体“Pussy Riot”因为在莫斯科教堂中表演被俄罗斯政府逮捕了而无法参加这场会议。会议也邀请到了乌克兰

著名的女权团体“FEMEN”(上半身裸体抗议)来分享经验。可惜的是“FEMEN”后来要到土耳其去参加一场抗议，她们觉得那比较重要。

会议期间我们也讨论了在乌克兰、波兰、俄罗斯等国宗教和极右派对女性的攻击案例。波兰的人类学家Agata Chelstowska检视了堕胎的辩论，以及在政党政治中如何被操弄；其认为这是波兰为了要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谈判的筹码，而非真正关心女人的生育和健康。Lesya Pagulich和Galina Yarmanova分析了基本教义派的论述，因为最近对于女性的堕胎、人工生殖、同性恋等议题，基本教义派的批评可说相当活跃，不容小觑。

至于国家和教会联手打压女权的现象也是讨论重点，并且是2012年3月8日女性主义大游行的主题。参加者总计超过200人，标语是“是该政教分离的时候了！”(而最近乌克兰才通过一项法案要对30岁以上没有小孩的人课税!)去年的口号是“少点家务劳动，多一点知识！”，“父母亲的社会支持

”，“家庭：让人爱的地方”等等。乌克兰女性主义者也要求释放“Pussy Riot”的成员。

游行之后，在3月12日于Verkhovna Rada(乌克兰国会)，当副议长Andriy Shkil提案禁止堕胎时，反而发生了攻击女性的事件。现在的法律允许怀孕小于12周的女性堕胎。2012年秋天的选举一定会大肆炒作这个议题。

在宗教和政治联手攻击女性的生育权之后，女性的NGO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乌克兰总统，要求堕胎除罪化。2012年3月27日，女权运动人士举办了记者会：“屠杀女性：多胎罪刑化的危险”，要求停止这个歧视的法案，停止侵害女性生育权利和健康。

总之，在近2年里我们发现乌克兰的女权运动相当活跃。相信很快地在不久的将来，女权运动一定会战胜父权压迫！ ■

> 日益危险的 拉丁美洲

by Gabriel Kess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阿根廷的抗议人士要求“Stop Insecurity”。2009年摄于Buenos Aires

拉丁美洲的犯罪问题日益严重。这里的人口不过占世界的14%，可是因武器而致死的人口却占40%。在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等国虽然犯罪率是较低的，不过人民仍然处于生命危险的恐惧之中。我用多元的研究法去探讨阿根廷人们对于“不安全”的感受，并且和其他国家做比较。1大众对于犯罪的恐惧日益蔓延，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于社会的想象和作为。大家

都认同这是个公共议题，并了解到和过去的犯罪现象并不同，我们而且必须仔细考虑相关的因素、人们遭受的风险、以及解决之道。部分答案其实可以在研究不安全的社会学知识中找到。研究结果显示出：不安全感以往很不一样。一方面这和之前对于威权统治的恐惧并不相同；二方面，那些其实相对安全的群体却对抱有着很深的¹不安，这是个新的现象。

>>

第一个相关的研究出现在美国1960年代。此后，对犯罪恐惧的研究就和犯罪学本身独立开来了。犯罪恐惧感在犯罪死亡人数增加时会提高，但是即使治安好的时候，恐惧感也没有因此下降。犯罪恐惧感是指人们在面对犯罪行为式的情绪反应。然而，我们比较喜欢用“不安全感”这个字，因为虽然恐惧还是我们主要的关心对象，不过，“不安全”包含了更多的意义，例如生气、愤怒、无能，而且这有政治的意义，让我们找出原因以及相关的行动表现。

那什么是阿根廷人民的不安全感呢？不安全和违法并非总是相关的。不安全感其实是一种威胁：一种对于生命和财产的威胁，而且有可能危害到任何人。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它会影响人们心中区别安全和不安全的那一条界线。另外一个面向是不安全感对象的不确定性。所以威胁不再是来自于局限于刻板印象的群体(如无所事事的青少年)，而是任何一个人。这也让随机的不安全感更加强化。

相关研究也指出了许多尚待解答的问题和谜题，例如：为什么在风险相对低的群体(妈妈或小孩)里，却觉得自己极度不安全呢？恐惧和阶级有关吗？我试着从阿根廷的研究中去回答这些问题。量化分析显示，上述差异没有特别显著，不过质化结果却指出了差异的轴线索在。普罗阶级觉得物理与社会的威胁感很大，不过中上阶级却相反。亲近性影响了由下而上的政治解读。在普罗住宅区中，对于犯罪个案都有争议和讨论，而且由小区本身提出解决办法。在中上阶级里，由于距离犯罪比较远，所以对犯罪的观点都是由上而下，没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然而，亲近并未带来同情，疏远也未带来苛责。亲近性反而会产生道德上的指控，因为即使处于相同的社会阶级，家长都会强调“我的孩子并不会偷东西”。反而，中上阶级的人会说“其实这些小孩子并不坏”。疏远通常会用结构因素去解释犯罪行为，或是政治性地解读为犯罪是现代版的游击战。所以，责骂的程度和阶级的高低并无区别。

性别则是这整个谜题的核心。研究指出女性通常有较深的恐惧。而相关的讨论也都强调这个性别差异。可是，当不安全感扩张到其他社会群体时，也会越合理化于恐惧的表达和感受也。若我们结合量化和质化的分析，会发现在量化中比较不怕表达恐惧的群体，在访问中也对这种恐惧感的表达感到非常正常。

当在少数群体中测量恐惧时，这通常和对于威权主义的态度相关。在当代，有一项争论

是不安全感的增加是否也提高了赞成严格惩罚罪犯的态度。通常说来，恐惧会随着不同的政治意识型态而不同。而不安全感也会减少对民主的信任。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趋势：乱世用重典。这意味着大家会越来越赞同严惩罪犯，即使对于轻罪也是如此。而我们对于社会危机的解释也越来越没效，因为以前的共识是犯罪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而今虽然经济或平等有所改善，犯罪却没减少。因此，对于拉丁美洲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去为乱世用重典的现象找到更精致的解释。而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现象已经从将犯罪行为归因给社会结构转变为指控个体行为了。

上述这些只是关于不安全感的一部分问题而已。若要能解答这些问题，或是让这些问题可以被社会所广为认识，那还有赖于我们民主政治的质量了。 ■

注1: Kessler, G. (2009) El sentimiento de inseguridad - Sociología del temor al delito [The Feeling of Insecurity: Sociology of the Fear of Crim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 哥伦比亚的 黑人中产阶级： 矛盾修饰法？

by Mara Viveros Vigoy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Bogotá, 哥伦比亚

根据研究指出，哥伦比亚的黑人是收入最低、生活水平最差、童工比例最高、最没有社会安全保障的一群人(Urrea et al., 2004)。再者，这些事实也证明了哥伦比亚种族主义的横行：只有很少的黑人男性和极少的黑人女性在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里面工作，而且媒体上黑人的形象总是很差的。在这个脉络下，我们若是想要研究上述这些现象以外的黑人，有意义吗？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去再现非裔哥伦比亚人的历史进程，因为这样的历史通常被排除在官方历史论述之外。所以相较于对黑人充满刻板印象的官方历史，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历史图像。

此外，我们也从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以往被忽略的因素，像是性别、种族、阶级等，而这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哥伦比亚的黑人中产阶级的形塑过程

。以下我将介绍回顾这样的研究结果(Viveros and Gil, 2010)。

>谁向上流动了？

在20世纪的时候，农业和矿业带来的资本的大量积累，加上教育机会的增加，在许多地方出现了黑人中产阶级。黑人中产阶级虽然还是会遭到种族歧视，不过他们相对地可以在经济或政治上取得影响力。我以下要介绍的案例是来自于Bogotá的黑人，他们多数来自于太平洋区，也是最多哥伦比亚的来源地。

若分析三代的黑人社会流动轨迹，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主要群体：继承父代或祖父带的社会阶级，以及阶级向上流动。我们还可以发现社会流动的差异点：有些人是逐渐的流动，有些则是快速流动。女性相较于男性，向上流动的机会比较少。向上流动的黑人女性通常是专业阶级的后代，或至少上一辈

有一定水平的教育程度。反之男性并非如此：向上流动的男性有可能其父亲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若我们看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上一代教育情况，会发现教育取得的改变通常发生在第一代和第二代。

>黑人向上流动的性别议题

社会流动除了代表的收入的增加之外，也代表了阶级惯习(class habitus)的继承。虽然这通常指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过这之中也有性别和种族的差异。中产阶级除了本质上就是为了和普罗阶级进行区隔之外，他们性别组成也是基本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下，社会流动也包含了上层阶级性别规范的内化，也就是要成为可以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的男人和女人。更精确一点，就是黑人女性要像白人或是混血的女性看齐。这种自我教化的过程影响了那些

从属阶级的人，不论在工作场合或是家里，都要把他们转变得有纪律、有想法、有活力。

在我们访谈过的女性之中，会发现白人女性的文化就是要成为模范母亲或太太，说话、举止都要有有条不紊，中规中矩，完全要像个上流社会的女性一样。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黑人女性要从很早开始，或至少在婚后，就要“去性别化”，否则很有可能被认为粗俗淫荡。对男性来说则是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负担起经济重责大任，举止合宜，坚持自己的男子性，必且在公共场合像个绅士，如此才能完全摆脱众人对于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懒惰、粗俗、下流。

>个体而非集体的向上流动

哥伦比亚的阶级流动通常都是个人式的流动，这美国的集体阶级向上爬升不同(Frazier, 1975)。在哥国，黑人中产阶级还没办法将这样的阶级流动形成一股集体力量，也没办法将影响力超出个人的家庭范围以外。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阶层路径的分析可知：成功黑人的例子同常

是受惠于自己的家庭。而这样的例子还不足已影响到整个黑人社群，也很难成为黑人族群的模范。同时这也显示了黑人社群内部的差异。所以，当我们在考虑性别、阶级、性的时候，很难排除掉种族的因素。

当我们想要解决社会边缘话或是种族歧视等问题的时候，社会流动的研究就显得相当重要。哥伦比亚的黑人中产阶级其实是个特例，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因素都不利于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而这样的案例也提醒了我们种族主义始终在那边，从未消失。并且，由于这个案例的复杂性，也代表了当我们在关照黑人群体的社会问题时，黑人中产阶级仍然是个不可不去考虑的重要因素。 ■

References

Frazier, F. (1975) *Black Bourgeoisie: The Ris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Urrea, F., Ramirez, H. F., and Viáfara, C. (2004)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 of the Afro-Colombian Population in Regional Urban Contex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Twen-

tieth Century." In M. Pardo et al. (Eds.), *Pan-Afro Social Studies in the Pacific*. Bogotá: ICAN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lombia: 213-269.

Viveros, M. and Gil Hernández, F. (2010) "Gender and Generation in Black People's Experiences of Social Advancement in Bogota." *Maguaré* 24: 99-130.

> 俄罗斯社会学的真实面貌： 对Vakhshtayn论点的批判

by N.V. Romanovsky和Zh.T. Toshchenko, 俄罗斯社会学期刊Sociological Studies主编



俄罗斯社会学家Vladimir Yadov (左)和Nikita Pokrovsky (右)在莫斯科的社会学年会, 2011/6/6。

我们想针对Victor Vakhshtayn在全球对话2.3的文章提出批评, 并说明俄罗斯社会学的情况。首先, Vakhshtayn对于当代俄罗斯社会学的描述实际上受限于他过度狭隘的方法论观点。由于他不从事经验研究, 所以他的论点都是纲要性的。正因为Vakhshtayn没有类似经验, 所以他从未了解问题的所在。我们尊重他的文章, 可是必须承认我们不赞同他的论点。以下我们将阐述自己对于俄罗斯社会学的看法。

作为社会学期刊Sociological Studies (Sotsiologicheskkiye Issledovaniya; SOCIS。根据Vakhshtayn的调查, 有66%的2008年俄罗斯社会学年会的参与者有阅读这份期刊)的主编, 我们长期接触浸淫来自Moscow、St. Petersburg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社会学研究。在这里, 超过4000位的社会

学家发表研究, 的确, 他们并非总是非常顺利, 当然会遇到挫折。

>俄罗斯社会学

第一, 我们可以找到很有创意的研究, 涵盖了这个国家的各种重要社会现象。学术界都熟悉V.A. Yadov的作品, 其经验研究想要发展出原创的方法去处理工人意识和行为的变迁。而N. E. Pokrovsky教授(同时也是ISA执委)则研究北俄罗斯的农业生活过程。V.K. Levashov则研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 20年来都致力于永续发展的观念。最后, 本文作者之一Toshchenko的作品Paradoxical Man则受到了P. Sztompka, Z. Bauman, 和T.I. Zaslavskaya的推荐。

第二, 研究主题包罗万象, 并且地理范围也增加了。让我们提供一些例子。在Rostov的社会学家U.G. Volkov处理了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性。从Nizhny Novgorod来的A.V. Shkurko也论证了神经社会学的可能性, 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在型态学方法的基础上(收入、教育、权力)和论述符号(名声、重要性、地位), 在Irkutsk的O.A. Karmadonov研究社会阶层化, 并揭露了俄罗斯社会各种不同的转变过程。

第三, 研究活动越来越深入。对于著名概念的应用(如res publica)广泛, 像是应用到都市研究以及社会下层建筑的议题上, 这是由O. Kharkhordin所领导的

>>

(European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第四，后共产社会学带来了新的研究主题，例如V.V. Radaev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研究的市场化问题。他的研究在国内国外都很有名。

最后，在俄罗斯的每个大学内都会共同研究，和欧洲、美国、印度、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合作。这里我想不需要特别的例子来解释了，因为这具体的体现在我的学术发表的实践中。

俄罗斯社会学的重要性可从两份英文期刊中窥知一二：Sociological Research和Society and Education，由M.E. Sharpe，文章由Russian journals of sociology汇集而来。我们有超过30种的社会学刊物，并且都由自主的大学所支持，提供一个让学者可以分享、辩论知识的园地。

>俄罗斯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

要说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也鲜少是从成功的经验中发现。俄罗斯有超过300间社会学系所，110间设立有博士班，这是我们很骄傲的一点。但是这过去20年的急速发展也有缺点。我们训练的质量还有待提升，因为有些老师是从其他学科毕业的，所以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还是新手。

社会学的数据可说是社会信息的一部份，并且在俄罗斯，媒体都会引用社会学的数据。不过这也让大公司找到了操弄得空间，并且新闻业者会依据其利益审查新闻内容。在选举时期有许多自称是社会学家的人去投入选战，而这些人是在选举阵营花钱请来的假货。

和市场导向相比，社会学开始撤退到“社会学的社会学” (Vakhshtay在这点上是对的)。没错，社会学是该检视自己的学科预设，不过但是一旦当这变成了目的，那么社会学就会和社会脱离，最终就是变成一种剩余的学科，不再被社

会需要。不过若要说这是俄罗斯社会学的主流现象，那么也言过其实。有超过80%的俄罗斯社会学其实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包括经济、劳动、都市、农业、青少年、教育、偏差行为、政治等等议题。

Vakhshtayn对于他所言的新苏维埃和反苏维埃语言感到不悦。这种现象指的是有些学者属于比较传统，有些则背离了传统。对我们来说，这个论点一点也不新奇。“传统主义”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法研究现在的社会，而自由派社会学家则发现他们的期待并不切实际—因为俄罗斯之所以被这些自由派学者认为经济分配是不正义的，是由于俄罗斯的转型路径不同于西方。所以，十年前彼此针锋相对的论点如今已经逐渐聚合。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而是奠基于扎实的经验分析之上。尽管还是存在着差异，不过学术界都承认：经验研究所累积的成果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总之，让我们为Vakhshtayn的论点作个批判性的总结。Vakhshtayn把个人性的观点当作是俄罗斯社会学中各种立场的缩影，所以他批评的对象是自己扎稻草人。讽刺的是，他这样的论点正是他自己所反对的。■

> 擗节时代的英国社会学

by John D. Brewer, University of Aberdeen, 苏格兰, 英国社会学协会会长, 2010-2012

英国社会学(BSA)在2011年庆祝了60周年。BSA的2500名会员的规模,在世界上并不算大,不过却相当有力。这是历史上最多人的时候,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证明我们的生气蓬勃。我们现在发行4本期刊,有历史上最多的读书讨论会,以及每年举办2次会议。像是今年就举办了50个活动。不过这一切都被英国的高教改革给抵销掉了:取消对大学的公共补贴和减少资助学生。没错,BSA也关心擗节。

2012大会的主题就是擗节,在Leeds University举办,这是London之外最大的一场会议。我刚好也将卸任3年的会长职务,所以我以擗节时代的社会学公共价值为题演讲。Michael Burawoy和Zygmunt Bauman在理解经济危

机的政治影响这个脉络下辩论社会学的贡献。Stephen Ackroyd和Rosemary Batt直接处理危机的本质,探讨美国和英国的经济“金融化”问题。我们有来自24个国家的外国与会者,接受了622篇文章,其中62篇取消了发表。

在英国,擗节直接影响了大学教育系统,这也是社会学所关心的议题。许多系因此面临关掉或缩减的命运,并且学生申请大学的人数会减少,因此也直接减少了就读大学的人数,也会让学生选择实用导向的科系。在Strathclyde University的社会系就关了,其他学校也发现越来越少人申请社会系,有的甚至骤降。另一方面,其他科系的申请人数则是增加,甚至暴增。现在评估擗节的影响可能还言之过早,不过我们会持续关注。

擗节对社会学的影响不尽相同,可是情况很明显。我们的2012年会议中就强调了两个正面影响。擗节重新唤起了英国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平衡了文化转向后的社会学氛围,并让大家更积极参与BSA。若我过于强调后者,还请见谅。当学科分化并且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如此的脉络下,现在社会学家似乎用BSA来巩固自身的专业认同。随着单一主题系的消失,少数教师和研究员散布各地的行政职,并把BSA视为传统系的结构一样,用读书会取代系所演讲,然后BSA自己成为专业认同的焦点所在。BSA的候任理事长John Holmwood已经让这个主题成为社会学的必要课题,而且BSA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

> 横滨大会： 促进世界平等的桥梁

by 长谷川公一, 东北大学, 仙台, 2014日本横滨世界大会年在地筹备委员会主席



从Pacifico远眺横滨大桥

日本社会学会会长长谷川公一在去年5月组织了一个网络，处理讨论了3月海啸灾害的相关研究和信息。这个网络现在有150人之多。那次的地震、海啸、核灾引起了社会学界的注意和研究，包括了在危险地区的大规模访问。

>社会学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灾害，社会学的任务和角色为何呢？这样的艰困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进行问卷调查？我们要怎么和灾民建立出有意义的对话，又如何才可以协助他们？截至目前为

>>

止，仍然还有360,000人无家可归。这些人现在都住在临时屋里。在福岛，还有150,000人因为政府命令或是自己选择不要回家。

我们正在处理微观、中层、巨观的各种问题，像是，科技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都市规划、重建，恢复农业，耕种、捕鱼，创造就业机会等等；NGO则处理老人的照护。我们也关心小孩，还有那些失去亲人、朋友、房子的人；此外还有酗酒、暴力等的议题，并且还有性别议题。这些就像是一场社会学的戏剧，有男女主角。

>日本的女性反核占领运动

许多人非常担心福岛核电厂的情况。不过目前是蛮稳定的。在方圆30公里内的区域，包括东京、横滨、仙台，辐射值都在安

全范围内。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带着一个仪器测辐射。灾难发生后，我一直很推荐大家一本书：迈向核能社会。

女性在这次灾难后非常批评东电和政府。因为女性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她们要求全部赔偿她们和小孩子的损失。她们每个星期几乎都会举办大型的集会、演讲、以及研讨会。从9月过后，也就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日本女性和平地占领了经济和工业部，因为大家认为这个部门要替核灾负起责任。虽然政府和警察因为怕引起群众暴动，未采取强制驱离，但是抗议的女性仍然不愿离开。

>连结分隔的社会

在311灾难发生后，横滨市立即检视了该地的海啸历史，并且依据300年来小海啸的纪录更新的防灾准则。在地筹委会、日

本社会学、ISA一起为世界大会作准备，希望可以吸引和歌德堡一样超过5000人的参与盛况。我们将邀请全球的社会学家起到横滨体验强韧的灾后日本社会。

从会议地Pacifico我们可以看到横滨大桥。这是该地的地标。如德国社会学家Georg Simmel所说：桥是我们链接意志的视觉表现。我相信社会学可以连结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过去和未来、男性和女性、自然和社会。横滨正等着各位一起来跨越这座桥梁！ ■

> 意大利的大学， 拍卖中

by Laura Corradi, University of Calabria, 意大利



“意大利的大学快生存不下去了，因为已经病入膏肓，并且快被淘汰了。我想意大利的例子绝对是史无前例。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如今财务却非常吃紧。跟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比起来，意大利的大学的资金少得可怜。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学科更是如此，预算不断被删，因为政府认为应该要把钱花在经济和市场投资上。无独有偶，整个欧洲似乎都面临到相同的问题。大学的课程若要获得编列预算的支持，那必须是被认为有市场

价值，否则没人会理你。”以上这段话是从两位意大利学者Piero Bevilacqua和Angelo所撰写的文章“D’ Orsi, L’ Università che vogliamo”（我们想要的大学）中节录出来的。这篇文章并有上百位的意大利教授、学者、以及临时教师或学者(precari)所联署。

2010年意大利就有126,188名临时教师学者(precari)：41,349名约聘教授、24,934医学院实习生、23,996名辅导老师、以及17,942名研究助理。整体来说2010年还比2008年少

“我是无业游民”：Precariat成为新贫阶级

利大学的分崩离析，越来越没希望，且越来越私有化。

而意大利大学中的贪污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也很可耻的一件事情——则被用来当作抨击公立大学成效不彰的把柄，并且制订了许多糟糕的法律，像是恶名昭彰的Gelmini Reform——以Berlusconi政府的教育、大学、与研究部部长的名字来取名的。

这个改革法案是在预算删减的前提下制订的，并把权

力全部给了校长和正教授。另外，这个法案也伤害了大学自治的民主基础，裁撤了教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给予教师有参与决策的机会)，然后使得学术议会的功能几乎丧失。

另外一个让意大利的大学重伤的是废除公立学校文凭的法律价值。这让学生不想念公立大学，特别是那些缴不起高额学费的学生们。这样一来使得公立大学和其他的私立大学或是献上大学变得没有两样。

1968-1977年的学运是以那些通勤学生、在职学生等为主，运动诉求强调他们的利益与需求。而90年代的学运则是反对教育私有化，反对知识生产是为经济利益服务，像是La Pantera (The Panther) 运动。在2000年，新的运动开始萌芽，特别是在Berlinguer Reform之后。这个改革法案由“进步政府”所提出，要求大学的财务自主和减少政府补助，这样一来让大学和企业之间更加密不可分。

这个改革法案一伴随着2011年占领Rome University La Sapienza运动一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是不分党派共同的主牌。公立大学的私有化政策亦然，不论是中间偏左派或中间偏右派政党皆是如此。删减预算让学生福利缩减，奖学金变少，学费飙涨。这些激起了一波一波的学生抗议浪潮。2008年的运动L' Onda (The Wave)就是有一群副教授和研究员罢课。最后，这个运动也处理了学术临时工(precari)的议题。这些人只做全职的工作量却领半职的薪水，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lumpen-ricercariat。这也让当今各个职业的学术工作者一起集结起来发声。

而今我们都期待着“二次六八学运”的到来，意味着



希望这波运动终究会成功。然而最有可能的状况是这波抗议会促成与其他社运的结盟，一起对抗危机。可以和失业劳工运动结盟，也可以和indignados 运动结盟，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强迫式经济成长。这些拥有共同问题根源的不同社运若彼此结盟，那么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例如像是在2012年3月30日在Rome的全国大规模示威抗议，以及5月16-19日的Frankfurt的国际社运动员，都是很好的例子。

更多抗议运动的相关信息可以到：<http://www.atenein-rivolta.org/> (Universities in Revolt)。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文件、计划、报告、影像、信息。性别议题也是重点，因为自从女性在大学里面被歧视之后，这就是重要的议题。政府决定删减20亿欧元的大学运算，其中对女性的影响最大，因为女性的职位都是会被这波预算删减影响到的职位。这也会伤害到南部的学校，并且边缘化GLBTT。 ■

“Our future is now, life does not wait” : precariat的抗议标语

> ISA与联合国： 犯罪与刑事司法

by Rosemary Barberet,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美国

今年4月我以ISA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Vienna第21届联合国犯罪防制和刑事委员会(CCP-CJ)的大会。ISA具有非政府组织咨询的地位。我已经有参与观察此一会议10年的经验了，我认为，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学的视野，不论是社会学或是犯罪学都可以为CCPCJ有所贡献。

CCPCJ是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COSOC)的附属组织，成立于1992年，其所负责的议题包括了：

- 解决国家或国际犯罪的跨国行动，包括组织犯罪、经济犯罪、洗钱，并支持推动刑法在保护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 都市、青少年、暴力犯罪等的防制。
- 刑事系体系中管理的效率、公平、与改善。

CCPCJ负责发展、监督、审查犯罪刑事相关的业务，提供实质和组织上的建议，每5年召开一次会议。CCPCJ是CCPCJ基金的管理者。此一基金是联合国所提供给联合国药物与犯罪办公

室(UNODC)用来推动犯罪防制和刑法。CCPCJ由40个ECOSOC会员国中选出的代表负责主持，任期3年。

CCPCJ是由联合国犯罪防制与刑法项目网络所支持。此一网络由跨地区的国家所组成，支持联合国相关业务的推动(例如在网络中的联合国国家法律部门)。

每次会议都会有一个主题。今年是“针对移民、移工、及其家属的暴力”。这个主题来自于萨尔瓦多宣言，其是在2010联合国犯罪大会之后所提出，由土耳其所建议。这个主题相当切时，因为我们会看到媒体大幅报导中美洲墨西哥移民被警察遣返或是被黑帮挟持绑架，在Arizona沙漠中死亡，法国极右派Marine Le Pen的反移民言论、以及阿拉伯革命的中东和北非移民等的新闻。主题是交互相关的，因为这也和联合国负责处理移民毒品走私的部门有关，也和其他人权相关业务有关。虽说大多数都在讨论犯罪，可是François Crépeau (一位Special Rapporteur)也说人口走私也可能是在

保护人权。他以电影Casablanca为例去说明人口走私的正面部分。不过，我们还是要问：社会学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对于ISA该在联合国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上经验丰富，以提供给执行委员会或会员研究的参考。尽管ECOSOC和UNODC皆强调证据的重要性，不过由这两个单位所提供的研究却日益减少。3年来，ISA在会议中提供了文献回顾的部分，而ISA也要知道这部份的学术知识并不符合公众的需要，所以做出让公众可读可理解的研究是相当关键的。我们的文献回顾提供客观的知识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和解决问题，并希望可以减少不同知识的落差。

那么，若要能让公众理解，对ISA来说挑战是什么呢？联合国在提供给NGO信息这点上非常保留，只可以提供那些由秘书处核准的信息。他们也直接以口述方式提供。可是，联合国在决策上向来不透明。虽然会在公开会议中讨论议题，可是决策都在非正式场合理完成，NGO总是不得其门而入。NGO也不在mail-list中，这对讯

息传播很不方便。而联合国代表也对NGO的出版不感兴趣。具有咨询资格的NGO通常是议题和运动导向的组织，不向ISA有科学研究的基础。再者，在缺乏对话的前提下，信息的流通只能靠会员国的好意了。虽然我们的文件都有英文和法文的版本，不过若可以有所有联合国的语言，那是最理想的。

CCPJIC是联合国中负责犯罪刑事相关的主要组织，促使会员国同意减少犯罪的目标，若有社会学的协助，这个目标将会更快达成。 ■

> 对编辑ISA的eSymposium 感兴趣吗？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ISA出版副会长, 2010-2014

相信ISA的会员们都知道从2005年开始我们由Vineeta Sinha编辑了一份在线的电子刊物，叫做ISA E-Bulletin。他最近要改名叫做eSymposium了。这样的转变将会带来更多的讨论和互动，也会有更多非文字的影像或是影音档案放到在线。例如，最近一期由Zaheer Baber张贴的“Occupy Toronto: a photo essay”就是最好的例子。

Vineeta认为既然我们有了新的系统，那么这刚好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去找到一位接任她的新编辑了。这个新刊物已经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在上面了，，相信未来会更加缤纷丰富。你/妳或许对这份工作有兴趣，或是认识任何你/妳觉得会有兴趣的人吗？新的编辑将会在2013年的7月上任。请上[ISA网站](#)看看如何申请这份有趣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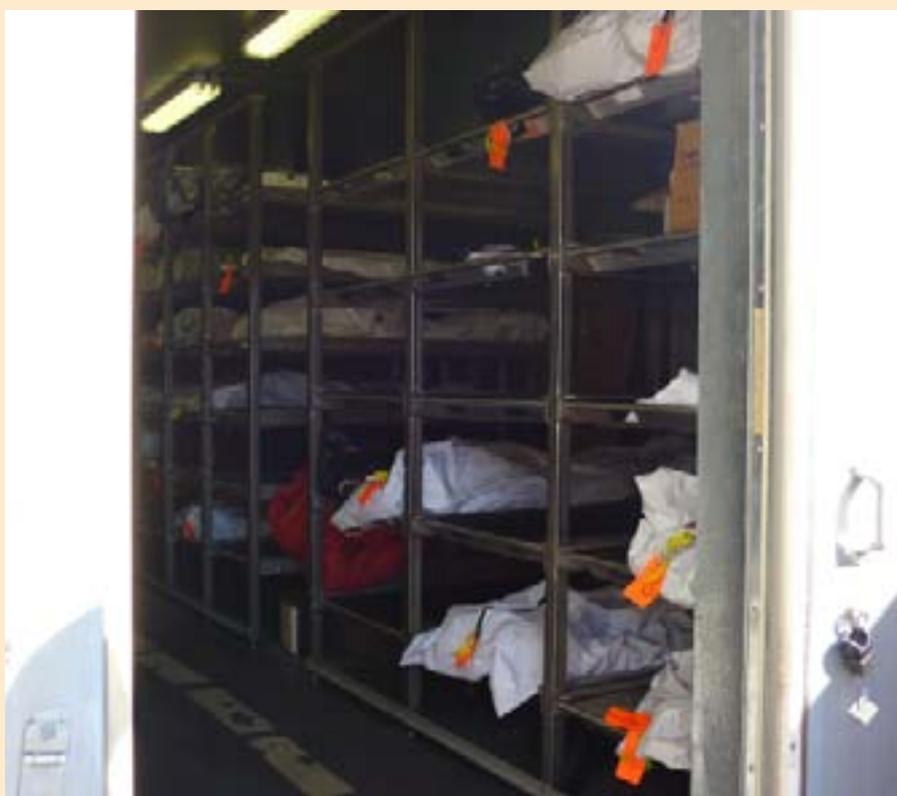
> Arizona沙漠： 移民的死亡陷阱

by Emine Fidan Elciogl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当我听到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拔腿跑开、开始反胃呕吐。尸体腐烂的恶臭在我身上挥之不去。我所拍到的照片是在Tucson的Medical Examiner's Office中的冷冻尸体。白色的塑料袋中装满了尸体残骸，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要偷渡到美国，却在死亡沙漠中丧生的人。

照片也捕捉到了州政府和这些不受欢迎人口(无论是生是死)的互动。自从90年代末执行边界的强硬政策，那些无证的移民被迫离开都市，逃到这个与世隔绝的沙漠。若这些移民想要在美国生存下来，那其实还是被“囚禁”着，下场不是被逮捕就是死在沙漠里。同时，他们在美国永远是非法移民，随时会被遣返，家庭随时会被拆散。

不过，只要他们一旦死了，州政府就会让他们永远留在美国。他们的尸体会被Border Patrol以四轮的车子送到Medical Examiner's Office。在那



里，个人物品会被妥善收好用以辨识身份，木乃伊化的皮肤被用来做红外线标记用，牙齿和骨骼用来检查是否可作为手术移植用。任何相关信息都会被送到领事馆或是人权组织，让其家属可以处理后事。同时，尸体也清楚标示着“John”或是“Jane Doe”，有时是“John/Jane Doe”，因为尸体已经难以辨识其性别。所有

尸体都放在冷冻柜中。州政府愿意花大把银子运送尸体、处理、保存，并由签约的殡葬业者处理遗体、埋葬在公有墓园中。可是，州政府从未想过要花任何一毛钱去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